

日本外交政策的背後

張廷錚

一 日本侵略政策的美麗外衣

傳說狐狸迷人的時候，要幻化成美貌的女郎，令被迷者死而無恨，想不到這一套技巧，竟被模仿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抄襲。五十年來，披着「人口過剩」的美麗外衣，內欺外騙，強迫中國化作它的「皇道樂土」。「人口過剩」這題目多麼堂皇，不但可以向列強替它的侵華政策做辯護，並且還能夠令被侵略者認為是命中的不幸，歸咎於天意。所以歐美的學者名流，如奧卻特根室等，也能委曲求全的原諒日本帝國主義，說它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解決「人口的壓迫」，而最可憐的是我們有些「麵包中毒」的「學者」，也居然去作應聲蟲，說什麼「日本人口問題嚴重，向外擴張，是他們應有的國策」。

那麼日本果真「人口過剩」嗎？假使日本真正「人口過剩」，對朝鮮台灣總不會放鬆吧？因為朝鮮台灣的人口密度，既遠較日本國內為低，在政治上經濟上，日本人又處於絕對的優勢，而氣候土壤更無處不適宜於日本人的生存與耕植。可是鐵一般的事實，卻給侵略者以嘲諷。日本縱然為移民而特設了「拓務省」，對朝鮮台灣經營了五十年，可是向這兩處的移民，竟不及本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因為根據日本政府最新的統計，全國人口約一萬萬，本部人口約七千餘萬，在朝鮮的日本人，連官吏兵士在內，總計不過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在台灣的竟只三十一萬零七百七十七人，兩者合計仍不夠一百萬人。日本果真「人口過剩」的時候，以半世紀的長久時間，對可以任意宰割的殖民地，會只移民如此之微嗎？

假使這還不能令日本人折服，那麼我們就拿日本國內的人口密度看

吧！日本內地的人口密度，縱然不說牠是十分稀疏，可是也決不較一般國家為密。除了殖民地，日本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亦僅為一百八十一人，可是比利時為二百七十一人，荷蘭為二百五十八人，就在日本侵略者所鍾愛的中國，根據十年前的統計，江浙等地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竟在三百以上，而在日本人口最密的九州，還只有二百八十八人。至於北海道，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竟稀疏到只有三十五人；而我們東四省，反有七十四人，較北海道高出一倍以上，較美國竟多了兩倍。日本果真是「人口過剩」，為什麼不先移民至較我東北人口稀疏倍餘的北海道，反而要侵入遠較其人口稠密的江浙呢？

再說那被日本強佔十年了的東四省吧！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就規定在十年內要向東北移民一百萬人。可是九一八以前，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日本人在東北的，總共不到二十五萬人，其中大抵還是滿鐵職員及其眷屬、士兵和娼妓，純粹的移民，反不多見。九一八後，日本為了準備對蘇作戰的後備軍，和鎮壓我東北民衆的武力反抗，到一九三四年底，武裝移民有三四批，而總數竟不到千人。所以根室在亞洲內幕中，也不禁感嘆的說：「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得了東四省，但是儘管地富人稀，日本移民卻祇有一萬——小得無以復加的一個數目——而中國人卻上百萬的出關。雖然日本當局以種種方法鼓勵並資助本國的移民。」假使我們仿效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口吻，這不成了中國內地「人口過剩」的證據，和應該侵略日本的「口實」了嗎？就根據一九四一年版的朝日年鑑所載，日本現在居住東北的人口，合其大批的偽滿官吏、公司鐵路職員以及其眷屬，再加上近二十萬的武裝軍人和軍人附屬品的娼妓在內，日本在「滿」人口較一九三〇年還沒有增加一倍，即僅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四人。這難道算是一人口過

剩」的證據嗎？

現在我們再看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口供吧！據日本「侵略經典」田中奏摺的解釋，似乎日本每年有剩餘人口八十餘萬，無處安身，為解決這種人口壓迫，所以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但是連荒木貞夫都覺得這未免太不通了，於是在其「告全日本國民書」中，不打自招的說：「對於現在日本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米糧，這件區區小事，我們也還有法子增加生產，可以養活他們。」日本帝國主義者坦白地吐出了它的「口供」，相信日本「人口過剩」的「學者」們，這還不夠驚醒你們的愚昧嗎？

二 日本侵略外交的經濟基礎

「人口過剩」只是日本的侵略口實，那麼決定日本外交侵略性的力量，究竟在那兒呢？這首先就要瞭解日本資本主義之軍事之半農奴制的性質。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過對外的政治稱外交，對內的政治叫內政而已。雖然政治對經濟也能發生逆作用，可是經濟活動究竟是一切政治活動的底流與基礎。換言之，外交就直接要受經濟的規定。所以不瞭解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就不能把握日本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性。

日本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徵，據山田盛太郎的研究，是以龐大的半農奴制的零碎耕作為地盤，以廣泛的半奴隸的零碎耕作農民及半奴隸之工資勞動者之勞役「土壤」為基礎，在這上面構築了巨大的軍事機構——即鎖鑰（Key）式的產業體制。所以日本資本主義軍事的半農奴制的性質，不僅為資本關係創造過程的特徵，就是在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間之確立產業資本的過程中，在日俄戰後第一階段之金融資本形成的過程中，在世界大戰內第二階段之金融資本確立的過程中，以及戰後的一般危機之過程中，均為其基本的特徵。

日本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產生，就由於其軍事的半農奴制的金融資本之矛盾。因為半封建關係的存在，阻礙了國內市場的成長，於是不斷要求擴

大其殖民地。為對殖民地傾銷一切商品，又要建設各種工業部門，向海外尋求原料供給地。於是國內雖然也缺乏資本，卻又不免向國外市場輸出資本。並進而對交通線，根據地，也必須作「軍事的獨佔」。日本資本主義這種內在的矛盾，不但未阻礙其高度帝國主義的膨脹，反而對「膨脹」發生了一種促進作用。因為只有作更高度的帝國主義之膨脹，日本資本主義才能因新的震動而延續其生命。這由於日本資本主義，不但出世太遲，而又先天不足，所以一出生就只有採用戰爭為侵略的手段。換言之，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立，是後進的，完全靠了國家的「權力」，才能急速成長，而當時先進列強已將殖民地分割殆盡，世界資本主義，走到了自由競爭的盡頭，正邁步踏進了帝國主義的過渡期。所以日本資本主義，只得靠了軍事勢力的獨佔與對隣近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國這塊肥美的處女地——的侵略獨佔補充了代替了一部分的金融資本的獨佔。到了日本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這種軍事勢力的獨佔與對隣近弱小民族的侵略獨佔以及金融資本的獨佔，合三位為一體的時候，日本就更瘋狂的伸出侵略的魔手，怒吼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因此現代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由對亞洲和南太平洋的「軍事勢力的獨佔」與「金融資本的獨佔」之結合所規定。

日本成為亞洲的強國，是由於中日俄戰爭的軍事勝利而日本成為世界的強國，卻由於強大的軍事勢力與對隣近弱小民族的侵略與支配。日本資本主義不但以中國為其商品的販賣市場，原料資源的供給地，並且還把中國當作它的軍事根據地，以便北攻蘇聯，南襲南洋。而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為克服各自的恐慌，積極的採取了統制經濟，集團經濟的政策。於是缺乏國內市場與原料資源的日本資本主義，為組成龐大的集團經濟圈，就要求世界領土的再分割。而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素被其視為半殖民地的，而又抵抗力最薄弱的中國。於是一九三一年勃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資本主義繼其對東四省的「軍事的獨佔」，而逐漸結成了所謂「日滿經濟集團」，更漸進而強化其「金融資本的獨佔」。但是東四省並不能滿足日本之市場與原料的要求，反而給日本增加了龐大軍事費的負擔。於

是日本帝國主義，又將「軍事的獨佔」擴大至毗連東北，抵抗力較弱的華北並進而企圖對全中國作「金融資本的獨佔」。於是一九三七年日本在盧溝橋發動了企圖獨佔全中國的侵略戰爭，而將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作孤注的一擲。雖然日本對外蒙也完成它的「軍事獨佔」工作，但是因為蘇聯的援蒙政策遭受了軍事的挫敗，總之，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的侵略，是採取着「軍事的獨佔」與「金融資本的獨佔」之兩頭的侵略政策。所以日本的大陸政策就表現了軍事工作與政治經濟工作的「二重性」。而大陸政策對於日本的意義，就是擴大強化其在華的商品市場，投資市場，掠奪獨佔中國的原料資源，尤其是煤鐵等重工業原料，而另一重要目的，就在建設對蘇的軍事根據地。

在日本的侵略辭彙中，與「大陸政策」相對的就是「南進政策」。本來南洋羣島在第一次大戰前，已經是帝國主義列強間，殖民地爭奪戰的中心。這種爭奪戰，在下次大戰之中及大戰之後，尤為激烈尖銳。因為南洋一帶不僅是熱帶性原料，重工業原料的供給地和優良的商品市場，投資市場；而且還是軍事上，交通上的要衝，所以有其特殊的價值。因此國內市場既狹隘，原料資源又缺乏的日本帝國主義，自然要垂涎萬分，不肯放鬆一步了。遠在二十年前就高唱着「南進論」，以台灣南洋委任統治地為根據，一方面擴大強化日本在荷印英領殖民地，法屬安南等地的商品市場，他方面由政府竭力援助獎勵對南洋的投資，與獲取石油鐵礦，橡皮等重要原料。日本與這種經濟的南進政策相併行的，就是軍事的南進政策，即秘密擴充它的海軍，與加強南太平洋諸島的防務。一俟機會到來，就要席捲南洋羣島，利用其作軍事上的根據地，以達獨霸太平洋的美夢。所以日本最近打着「東亞新秩序」的大纛，乘着法國戰敗的頹勢，對安南作了軍事的政治的佔領，而將泰國也置於半殖民地的隸屬地位。現在則對荷印正採走着政治的談判與軍事的恫嚇之雙刀政策。

軍事的半農奴制的日本資本主義，為順應其發展，不斷的要求擴大其殖民地市場與一般貿易市場，而世界恐慌以後，這種慾望就更加熾烈了。因為日本經濟，自一九三一年後，主要的用政治的人為的方法，來克服恐慌，所

以在一九三三年前後，就展開了畸行的「日本景氣」。即不顧農業恐慌的嚴重與勞動狀態的惡化，純以日圓的貶值與殖民地低工資為武器，在世界貿易萎縮中，而令日本商品泛濫於世界市場。同時又因軍事費的膨脹與軍需品需要的增大，令軍需工業，也顯示了活況。不過生產之最初的不均衡發展，令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日益擴大，生產過剩的現象，就日益嚴重。但是國內市場既甚狹隘，對外傾銷，又遭遇了列強的輸入限制，日本於是除了用政治經濟的援助，去鼓勵輸出外，在外交上，又以調整通商關係，開拓新市場為通商政策。最近更因對華四年戰爭的消耗，美國對日禁運的實施，歐洲戰爭的擴大，令其存儲的物資既已耗費殆盡，而新的資源又無從獲得。所以自一九三九年以來，日本發現了有史以來未見的恐慌，不但鋼鐵饑饉，電力缺乏，油煤耗竭，就是食米日用品以及一切原料，都無不大起恐慌。日本今日除了想用獨佔南洋來解決迫切的困難外，更力謀與蘇聯中南美諸國，及近東的阿富汗波斯等調整通商關係，以求新市場的建立。同時對美國也頻送秋波，說是一日美關係並非不可改善。——野村最近在美的演說——以求日美商約的重行締結。

由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去分析現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則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外乎相互關聯的三種方向。第一是由「軍事勢力的獨佔」補充「金融資本獨佔」的大陸政策；第二是經濟的軍事的南進政策或海洋政策；第三是調整通商關係開拓新市場的通商政策。而這三腳的日本外交政策，就令日本與英美對立和中國作戰，並永難消除其對蘇的根本矛盾。現在不但中日戰爭，殊少結束的可能，並且日美衝突竟已愈趨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在這種戰時經濟的要求下，只有增發公債，增加租稅，強化獨佔，加緊對勞動者的統制與壓榨，那麼日本軍事費，縱然還能夠榨出若干，日本的軍需工業家，雖然還能夠發一筆「國難財」。但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將更悲慘，國內市場將更狹隘，於是更增強了日本對殖民地與國外貿易的高度依存性，那麼就更促進了日本外交的積極侵略政策。所以日本侵華的必然性，不在什麼欺瞞的「人口過剩」，而在其資本主義的軍事的半農奴制的特質。而日本的南進與反蘇，也是其歷史的使命，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而已。日本

帝國主義在演着「飲鴆止渴」的悲劇，但這又是他死不休的工作。

三 日本外交的「矛盾性」與「統一性」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現代日本的資本主義，是軍事的半農奴制的獨佔金融資本主義，所以日本政治形態的特徵，就是軍事勢力，半封建勢力與金融資本苟合下的金融寡頭政治。因此在過去，日本外交政策中，有着「霞關外交」與「三宅坂外交」的分野，現在又有着「英美派」與「軸心派」的鬭爭。這種外交的二重性，就由於日本的金融寡頭政治，是與其含有內在矛盾的軍事勢力，半封建勢力苟合而成的緣故。

日本的立憲政治，雖然開始於明治二十年代，但是政權依然握在以半封建藩閥爲母胎的官僚軍閥之手。而政黨內閣制，是經過日本政黨苦闘三十年後，以大正時代的「護憲運動」爲契機，才正式確立的。九一八後，日本政黨政治又隨犬養毅的飲彈而夭折，產生了所謂「舉國一致」的「強力政治」。本來政黨政治是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形態，在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所需要的是金融寡頭政治及強力的法西斯主義政治。所以從一九三二年的齋藤內閣到近衛內閣，政治的直接指導者，雖然是「軍事」的半封建的「軍部政黨與官僚」，但是政治上的根本支配者，依然是日本金融獨佔資本。

在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前後，日本政黨自動的被迫的次第解散了，就政黨說，這當然是它們劃時代的退卻與「被棄」。不過日本政黨政治，不幸出現於獨佔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黃金時代的曇花一現與九一八後的一蹶不振，原是它宿命的悲劇。可是日本政黨，無論是解散之前，或解散之後，都依然在代表着資本家與地主的利益，並且還保有着全國的選民。至少金融資本不致拒絕他們走進合法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陣營，去搖旗吶喊，所以現在也仍不失其爲政治上的一種勢力。

至於官僚，在過去明治時代的藩閥政治，官僚軍閥政治中，向爲一大支柱；盤據了貴族院，樞密院等，儼然是政黨政治的敵國。一直到大正時代，議會

主義勝利後，才漸次屈服於政黨之下。但是世界大恐慌後，貴族與官僚，就又侵入了政治的外層，九一八後，更乘政黨在政治上主動地位的消失，擴大了它的政治活動圈。

提到那令人「談虎色變」的軍部，則自明治維新以來，就儼然是日本政治上的一座巨大的獨立的王國。因爲明治時代，它已是藩閥政治，官僚軍閥政治的主體，而中日日俄兩役，更增高了它的勢力與地位。大正時代，雖然日本由政黨政治代替了藩閥政治，官僚軍閥政治，但是軍部以軍部大臣制及帷幄上奏權爲堡壘，仍然維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獨立性。不過從大正初期「護憲運動」至第一次大戰後的軍縮運動時代，究竟算是日本軍部政治勢力的落潮期。自九一八事變起，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又顯然增大，在七七事變後，軍部幾乎恢復到它在明治時代的勢力與地位。

所以日本的金融資本，不但利用着政黨做政治上的代言人，並且還與半封建殘餘勢力的軍部官僚相結合，對外實行侵略外交，對內加緊獨佔政策，而向強力的合法法西斯主義之途邁進。於是在軍事的半封建勢力與金融寡頭政治的「抱合」下，演出了由軍部、官僚、政黨三種勢力苟合而成的所謂「強力內閣」。這種內閣的構成，本身就充滿了對立與矛盾，何況軍部官僚政黨內部，又還包含着許多矛盾與對立呢？所以日本外交的「二重性」，「矛盾性」，不過是這種對立、矛盾的表現而已。因爲日本軍部所追求的外交目的，並非直接的去擴大商品市場與獨佔投資市場，而是爲了獲得「軍事的根據地」，獨佔軍需工業的原料資源，以達解除其軍事上的弱點，「軍事獨佔」之目的。但是日本金融資本，卻利用其代言人的官僚政黨，去追求以獨佔商品市場，投資市場爲目的的「金融資本的獨佔」。淺言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貫徹它向外擴張的目的，軍部要求拿槍尖征服一切，而政黨官僚卻主張施用點政治經濟的陰謀。於是日本外交在「戰事的獨佔」與「金融資本的獨佔」之一馬兩頭的政策下，在實行侵略的過程中，有着「軍事工作」與「政治經濟工作」的交錯。不過結局是「金融資本的獨佔」爲「軍事的獨佔」所補充，而仍然異途同歸，結合爲一。這就是日本侵略外交的「矛盾性」與「統一性」的內幕。

我們對於日本統治層的矛盾，要作正確的認識，固然不可以抹煞事實，否認其紛歧與對立，但是更不可以忘記了它們的「統一性」，而妄存利用其矛盾對立，即可苟安，或偏安的幻想。日本的財閥雖然常像彌勒佛似的帶着微笑，但是與軍閥的強盜面孔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水滸上的軍師吳用與惡煞李逵，在打家劫舍的時候，目的是一樣的，不過李逵在輪着板斧殺人，而吳用在搖着扇子指揮罷了。

四 中國北伐後日本外交與內政的關聯

日本外交爲其國內的階級矛盾與支配層內部的鬭爭關係所規定，同時又順應這種矛盾關係勢力的消長而變化。所以日本的內政，一方面受着日本外交的影響，他方面又給日本外交以限制。在一九二四年的加藤內閣，和一九二六年的若槻憲政會內閣時代，幣原外相根據「國際協調主義」實行了所謂「協調外交」。幣原外相，不但是最能代表金融資本的利益，並且還有着政黨政治的基礎。因此他抑壓了軍部的「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實行了對華緩進與和平軍縮的政策。但是中國國民的覺醒，已經不容帝國主義者作和平侵略的好夢。同時若槻內閣，又因臺灣銀行救濟問題，被封建殘餘勢力的樞密院所打倒。於是田中政友會的內閣繼之成立，而軍事的半封建的勢力也隨之高漲。田中義一以首相自兼外相，立即出兵濟南，想以武力阻止中國革命的成功。於是日本的對華政策，由偽善而變爲兇橫。但是在實踐軍部大陸政策的時候，既遭遇了政黨相當強力的牽制，又激起了日本內部的階級鬭爭，尤其重要的是喚起了我們全中華民族的反日運動。於是田中內閣，內外交困，終因預埋炸彈，暗殺張作霖事件而崩潰。幣原東山再起，連任一九二九年濱口民政黨內閣，一九三一年若槻內閣的外相。但是自世界恐慌開始後，相對的安定化的基礎，既經崩潰，而日本國內的政治危機與國際的對立，又日趨尖銳。當時幣原外相的對華協調政策，內受陸軍對華急進派的譴責，外遭中國革命勢力的反擊，而其軍縮政策，更爲日本海軍強硬派所痛恨，葬送了濱口內閣。九一八事變勃發，幣原的

「協調外交」就宣告破產，於是日本的原始法西斯運動，遂以軍部革新派及右翼團體爲主力而抬頭。

一九三一年底犬養毅政友會內閣成立後，出現了最近充任荷印經濟談判特使的芳澤外相。當時日本因爲政黨內部的腐敗和軍部發言權的增大，政黨已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動地位。而九一八事變的擴大，一二八事變的勃發，僞滿的產生，日本與國聯的衝突，令日本的國際關係異常緊張。政黨既失去了控制軍部的力量，芳澤就只有追隨在軍部大陸政策之後，而實行所謂「追隨外交」。但是日本原始的法西斯運動，仍以非法的方式而發展，於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被身着軍服的日本軍人，在首相官邸中所慘殺。

五一五事件前，日本已經有了樹立「強力軍政內閣」的運動，犬養毅之死，結束了日本的政黨政治，開始了軍部指導政治的局面。一九三二年五月出現所謂「舉國一致」的齋藤內閣。表面上是軍部官僚，政黨各勢力的均衡體，但政治的指導力，卻在軍部。七月內田康哉就任了外相，但是無論進攻熱河也好，退出國聯也好，內田只做了軍部的傀儡，一切都由荒木陸相來指揮。內田雖厚顏的唱什麼「焦土外交」，而日本新聞界卻譏評着「外務省失蹤」，只承認其爲「荒木外交」。而日本原始的法西斯運動，以一九三一年——三二年爲頂點，自一九三三年七月「神兵隊事件」後，暴力主義就漸趨沈滯，而走向合法的強力的法西斯化過程。在這過程中，內田外交也就轉換爲廣田外交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新官僚的廣田繼內田任外相，翌年七月齋藤內閣因大藏省的貪污案而引咎辭職，隨田內閣繼起，廣田外相留任。在日本第六十七屆議會中，廣田大言不慚的說：「我在外省任內，斷不致發生戰爭。」而提出「協和外交」的口號。於是極力調整日美日蘇關係，緩和中日武裝對立的形勢，而對內也拿出外交手段，以求軍部與財閥主張的協調一致。所以新聞界對廣田有着「八方美人」外交的譏評。而資本家們，卻稱頌他爲「和平外交」。廣田外交真算得什麼和平外交嗎？他的外交政策，大體可以分爲三方面：第一是根據「廣田三大原則」對華作政治經濟的侵略，亦即完成

119432

「金融資本獨佔」的大陸政策；第二是調整通商關係，開拓新市場的通商政策；第三是要求海軍均勢，廢除華府軍縮條約，退出倫敦軍縮會議的海洋政策。這就是廣田外交的內容，這就是最適宜於合法的強力法西斯過程的外交。假使回顧一下德國在歐戰前對英美的態度，我們就可以「思過半矣」。

一九三六年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是急進法西斯對金融寡頭政治的反動。但是原始的急進法西斯終於一時被政治的權力所壓倒，不過反觀一九三四年日本陸軍的小冊子問題，十一月事件，一九三五年的國體明徵問題，永田中將被刺事件等，就可以知道以軍部革新派為中心的潛勢力，仍舊是如何雄厚了。但以二、二六事件為轉機，日本原始的法西斯勢力，究已漸趨凋謝。所以廣田內閣敢聲明「反矯激而尚中正」，同時二、二六事件的判決，陸軍的大移動，都證明了軍部統制派的勝利。就這一切事實來觀察，可知二、二六事件不但會予日本急進法西斯以打擊，並且令日本金融獨佔資本，為加強其獨裁計，堅決地走向了自上層變革的強力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之途。而廣田內閣，不過是走向合法的強力法西斯主義過渡期的內閣而已。因此有田外交雖然標榜了「確立自主積極外交」、「強化對華對蘇外交」、「充實經濟外交」的三大外交政策，並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了反蘇的「防共協定」，實際上仍只是廣田外交的延長，亦即適應合法的強力法西斯主義過程之外交而已。

廣田內閣辭職後，一九三七年二月，「越境將軍」林銑十郎繼起組閣。這是軍閥統制派的登臺拜相，也就是金融獨佔資本對急進法西斯的澈底抑壓。於是素被視為英美派的佐藤尚武駐法大使，升任了外相。佐藤外相在議會中首次發表演說，就坦白地指摘外交不應該受軍部的支配，於是以軍部革新派為中心的右翼勢力，怒火衝天，紛起攻擊，說佐藤既中了歐美民主主義的毒，又不明瞭日本的國情與國體，公開提出了一「打倒佐藤」的口號。於是林內閣外遭急進法西斯殘餘勢力的反攻，內因軍部與政黨的衝突，被迫而解散議會，改選結果，政黨獲勝，林內閣懸棧無術，只好拂袖而去。

日本金融獨佔資本，為鎮壓急進法西斯的反攻，為實現其自上層變革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的要求，為調和因林內閣解散議會而起的軍部與政

黨的矛盾，為達到與軍事的半封建勢力歡洽的目的，於是打出了最後的一張牌，這就是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一次近衛內閣。不幸近衛內閣仍然建築在軍部官僚政黨的苟合上，徒有「舉國一致」的外貌，而實際上卻是充滿了矛盾的「弱體」。加以中日戰爭的發生與擴大，大本營的成立，更將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無限增高了。一九三八年五月，「政界惑星」宇垣繼主張戰爭「不擴大」主義的廣田任外相，首先聲明，對各國在華權益，決不妨害。繼稱「苟中國局勢有重要變更時，則日本自有重新考慮其態度之必要」，而「對第三國的調停，當充分檢討其動機與性質」。於是英日外交，頓形活躍。中國市場資源之「金融資本的獨佔」要求，所施的外交政策而已。但是軍部為完成其「軍事的獨佔」工作，七月初由板垣陸相發表了一「非打倒國府無和平可言」的強硬論，主張堅持一月十六日不以國府為對手的聲明。於是一面抨擊宇垣的對英談判是軟弱是誤國，一面提出組織「興亞院」問題，主張將對華的一切大權，均歸「興亞院」。軍部的陰謀，不但要將「外務省」化為有名無實的機關，並且是要獨攬日本內政外交的實權。宇垣力爭不勝，對華誘和又毫無成績，加以本身的安全都成問題，只好將外相的椅子讓與有田。而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宇垣外相的辭職，已經注定了第一次近衛內閣的命運。日本「金融資本的獨佔」工作，被「軍事的獨佔」所超越；近衛代表金融資本發表了一篇最後掙扎的「近衛聲明」，而仍然遭受了蔣委員長的嚴正駁斥，近衛無顏懸棧，只好將擔子卸與平沼。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內閣成立，十三名閣員有七名是近衛內閣的閣員。而平沼也自承「近衛首相允留於新閣任不管部大臣的原因，係欲對外表示新閣仍遵照舊閣之大政方針處理一切之意」。所以平沼內閣完全是近衛內閣的蹈襲，有田外交也只是「蛇尾外交」而已。正當日本外交畏首畏尾，徘徊瞻顧，莫知所措的時候，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德蘇突然簽訂了互不侵略，平沼悲嘆國際局勢的奇怪迷離，而結束了他那短命的內閣。

兩年餘的抗戰，已令日本的物資消耗殆盡，一九三九年八月阿部繼平沼組閣的時候，日本不但對外關係陷於孤立，而內部正也因食米、木炭、石炭、

砂糖以及一切日用品的缺乏，民怨沸騰。阿部既無術點石成金，物價政策又自相矛盾，加以內閣內部政治的貧困與弱體性，一上臺就被軍部喝倒了。野村吉三郎以海軍大將任外相，原想調整對美外交，不料美國竟毫不留情，說不管日本的外相是什麼人，如果日本的侵略政策不變，日美關係殊難有什麼新發展。尤其不幸的是發生了「貿易省設置問題」的糾紛，「外務省」人員向野村聯名辭職，同盟罷工，「獨眼將軍」變成了「獨脚外相」。內政忙不完，不要說是外交了。日本第七十五次議會開幕，衆院議員表明了不信任內閣，而陸海兩軍又認為「際茲對華事變處理之際，國內政情的不安，深堪遺憾」。囑阿部善處。阿部只得含羞忍淚，退出那才住了四個半月的首相官邸。

119433

一九四〇年一月，米內內閣承襲了這一破局，在日本「軍事獨佔」與「金融資本獨佔」的矛盾要求下，既想繼近衛平沼阿部的利用對英美外交之調協，以急速「結束事變」，又欣羨着德國在歐洲的意外進展，要在軍部的督促下，去進行與英美衝突的南進政策。於是有田外相不但要周旋於克萊琪格魯之間，還得小心翼翼地觀望軍部的顏色。於是日本軍部對有田外交加上了「墨守舊體制外交」的頭銜。攻擊內閣沒有趁着德國在歐獲勝的機會，進一步與德國合作，去搶奪南洋。「令日本有千載一時之悔」。而日本內部，既有新黨運動的澎湃，近衛又辭去樞密院議長，表示有實行「強力國內體制」組織「新黨」的決心。米內內閣，實已惶惶不可終日了。不過爲了挽回其末運，還表示了新的外交方針，首先發表的是維持安南荷印現狀的聲明，接着在去年六月二十九日，由有田外相，用廣播的方式聲明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確立包括南洋諸地之東亞新秩序圈爲方針」。可是這一廣播不但未能討好軍部，反被烟陸相斥爲「無可屬望」。繼之烟陸相代表軍部發言說：「爲圖外交之刷新，應促進新體制之確立」，要求米內考慮內閣的進退。米內還想作最後的掙扎，說日本「不必有新體制」。於是烟陸相辭職，軍部拒絕推薦後任陸相，米內內閣才不得不結束了它的命運。而日本政黨也隨着米內內閣退出了政治的舞臺。於是日本金融獨佔資本指導下的合法的強力法西斯主義運動，又展開了新的姿態，而日本外交，也就從

有田外交，轉換爲松岡外交了。

五 松岡外交往何處去

日本金融獨佔資本所需要的是自上層變革的強力的合作的法西斯主義，而非自下而上的暴力的急進的法西斯主義。所以五一五、二六式的急進法西斯的暴動，日本財閥對之，是又急又恨，結果就一面利用政治的權力去徹底抑壓，一面又努力促進合法的強力的法西斯之發展。但是中日戰爭的擴大與持久，令急進法西斯派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財閥縱能利用權力抑壓急進法西斯在國內的活動，可是要完全控制住在華的急進法西斯卻常有鞭長莫及之嘆。並且日本金融獨佔資本與軍事的，半封建勢力的奇妙「抱合」，原係以平衡軍部、官僚、政黨三勢力的「強力內閣」來表現的，而自侵華戰爭發動後，軍部的勢力愈強，政黨的勢力愈弱，三種勢力早已失去平衡的可能性，只是向軍部絕對優勢的一面繼續傾斜。軍部對外「軍事獨佔」工作的急速進展，已令「金融資本的獨佔」工作，漸形落後，而急進法西斯利用戰爭機會的脫線活動，更對金融獨佔資本有發生離心作用之勢。這當然是日本金融資本所焦慮的大問題。

第一次近衛內閣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導日本政治入於「強力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完成軍部與財閥的「抱合」。但不幸卻失敗了。可是金融資本目睹着急進法西斯的再度抬頭，就更迫切的需要那「合法的法西斯」之急速實現，而最適宜於擔當這任務的，仍舊是那較孚衆望，貴公子的近衛文麿。

第二次近衛內閣，就是在這種需要下而產生的。但是要繼續實現自上變革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目前的戰時狀態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這一方面需要與國際法西斯的合作，以安撫鎮定國內急進法西斯的橫暴；他方又需要淘汰腐化落伍爲軍部國民所共棄的政黨，以杜絕急進法西斯攻擊的口實。所以近衛內閣的前奏是「政黨的解散」，而近衛內閣的開張，是德意日三國同盟的締結。不過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孤立急進法西

19434
斯派，即將軍部上層份子都吸收收入合法的法西斯主義的陣營。這就是柳川平助、豐田貞次郎入閣的意義。如果我們認為柳川、豐田、鈴木等的登台，和安井、風見、小林等的退陣，是日本金融獨佔資本在政治上的退卻，就不免為日本政局的「萬花筒」所騙了。

隨近衛而出場的松岡外交，當然要與此行動一致。所以松岡踏進了「霞關」馬上就斷行刷新，一刀撤裁了大公使級外交官四五十名，而起用了建川使、蘇野村使、美殖民地經營者的大橋任次官、素親德意公然高談法西斯的白鳥敏夫做顧問、白鳥會告訴美聯社記者霍華特說：「我歡迎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詞，正如歡迎極權主義這個名辭一樣。現在應該是我們和德意結為同盟的時候，美國『玻璃房子』的民主主義正與蘇聯的共產主義相攜手呢？」

松岡外交現在所表現的業績，就是三國同盟的簽訂，與日蘇中立條約的締結。假使泰越衝突的調停和安南實際的佔領，不算軍事的話，那麼也是松岡外交的「宏猷」了。

今後松岡外交往何處去呢？從松岡的親締日蘇中立條約到最近日蘇通商協定的簽訂看，似乎日本將一反其反蘇的歷史，要和蘇聯「永相敦睦」了。假使有人真這樣相信，那就不免為「時間老人」所笑。松岡在出任外相之前，曾在日本樞原神宮外苑公開演說，諄諄說明蘇聯決沒有放棄「赤化世界」的政策，只是想利用帝國主義者的火拼，去削弱帝國主義者反蘇的實力。一旦帝國主義者兩敗俱傷的時候，就是蘇聯發動「赤化世界」政策之時。這種基本觀念，松岡是不致改變的。日本金融資本家想也不會忘懷的，而日本軍部更是正在執行着「滅華反蘇」的大陸政策。假使德蘇形勢的緊張，一旦演變成軍事的抗爭，那麼日本會遵守什麼日蘇軍事中立條約，而違反它「強力的合法的法西斯」之反蘇的任務嗎？

繼蘇日中立條約之後，松岡的外交方向，似乎在作着對美的探試。從東京傳出了許多空氣，有的說「松岡擬作訪美之行」有的說，野村在美已經開始了外交的接觸，而如美國紐約日報之流，也表示着歡迎松岡訪美。這一類流言，或真或假，都不值得深究。而略略分析日本對美經濟的高度依存

性，就可以知道日本縱不能與美國「交如魚水」也斷不敢冒然和美國大戰於太平洋的。道格拉斯氏在美國亞細亞雜誌四月號會草一文，題目是「日本海軍是怎樣長成的，就證明美國每年輸入日本的石油和鋼鐵，比美國海軍一年所消費的要大無數倍。而拿提莫氏等也舉出數字，證明美國現在對日石油的輸出，七輪英的還多。日本如果真正失去了美國軍需資源的供給，不但南進發生問題，就是侵華戰爭也決不能再行繼續。何況日本果真能與美國調整邦交，就不但能繼續其對華的侵略戰爭，還可以妄冀利用國際的壓力，來急速拔出其在華的泥足呢？並且以今日的世界局勢說，英國不能不與美國採取平行政策，如果美國承認日本在南洋的「優越地位」——這是第一次大戰時，蘭辛石井協定中會施之於中國的——英國又將如何？我想美國倘若有這種對日「綏靖政策」的出現，一定還是為了積極援英，打倒希特勒的緣故。日本果能兵不血刃，獲得了南洋的資源，以建設所謂「大東亞新秩序」，難道果真還絕不接受，一定要拿它僅存的海軍，去援助德意和英美聯合艦隊火併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嗎？那麼松岡將不无情於美國，是必然的。野村大使說什麼日美邦交並非不可調整，更是在暗送秋波了。不過軍事的半封建勢力與金融獨佔資本「抱合」下的日本帝國主義，會與美國「永相睦誼」嗎？這只要看張伯倫對德「綏靖」的結果，就可以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一旦擁有了南洋的資源，就可以減輕在經濟上對英美的依存性，那麼日本新軍備完成的時候，會不效法德國，反噬「綏靖」它的主人嗎？何況以現在的世界情勢看，就日本強力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的要求看，恐怕德英戰局的發展，一旦在德國有佔絕對優勢的時候，日本就要向菲律賓、新加坡、達爾文，甚至向夏威夷出發了。

李頓爵士最近說，歐洲今日的危局，都是由於九一八時歐美列強，對日姑息政策的錯誤。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政策，是受了日本的鼓勵，同時又是對日的模仿，我們相信羅斯福邱吉爾氏，當不致重蹈張伯倫的覆轍，再令日本來模仿德意吧！

一九四一、六二〇重慶蓮花灘畔

作者附識：本文草成，在德蘇宣戰之前，所以語氣如此，本應修改，但截稿期迫，殊無改寫的餘裕，而保存原狀，未始不可作將來局勢發展之測驗。